



周恩来的故事

奉公楷模

周恩来严于律己的故事

许广亮



中共党史出版社

《周恩来的故事》之七

奉 公 楷 模

——周恩来严于律己的故事

许 广 亮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 · 北京

主 编:石仲泉 陈登才

副主编:冯世平

编 委:石仲泉 陈登才

沈丹英 杜世伟

蔡雨龙 蔡开松

冯世平

主 编 寄 语

继《毛泽东的故事》丛书出版之后，《周恩来的故事》又同读者见面了。这是青少年学习周恩来崇高的革命理想、情操和智慧，继承革命传统的一种普及性读物。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周恩来在国际国内被称为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楷模。有的外国作家说：中国总理是“一位完人”。我们实事求是地讲，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杰出的外交家，是非常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二十六年，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是人民的好总理。邓小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著名作家冰心认为周恩来是“中国自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的而且接受的‘爱’也是最多的一位人物。”

读了《周恩来的故事》，周恩来的形象更加亲切地

留在我们的心中。它使我们具体地认识到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周恩来是怎样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是如何正确参与制定和执行党的决策的；同时，也使我们更加领会他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怕艰难困苦的大无畏精神，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领导艺术；最后，我们还能领略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 and 风范，激励我们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党的十四大的旗帜下团结奋进，立志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跨世纪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目 录

主编寄语

国务院不能带头大兴土木	1
你们把室内原来的东西给我换回来	8
把我住过的旧房子拆掉	12
我们应该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17
作为总理我应该多拉几车	29
勤俭建国，处处厉行节约	36
总理的行李箱	47
严守党中央规定，拒收任何馈赠礼物 ...	54
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62
看戏、上公园，自己花钱买票	69
不要给我特殊照顾，我是你们中间 的人	74
不允许亲属有任何特殊	89
后 记	

国务院不能带头大兴土木

周恩来历来主张国务院要带头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建国初期，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他认为，应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搞建设和发展生产上，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上，而不是用到大兴土木、建办公楼和招待所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担任了政府总理。国务院（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叫政务院）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

中南海始建于辽、金，历经元、明、清各朝，以及多年战乱的旧中国，其中的古建筑年久失修，房屋残痕斑斑，而且都是老式旧平房。

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商议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这个会议厅同样也是老式旧平房，室内光线阴暗，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5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建议通过改建扩大

这个会议厅，但周总理不同意。国务院机关有关部门的同志只好自己动手，将室内的隔断打掉，稍加修理，又增加了一些会议桌椅，这样，室内的面积加大了，解决了开会时拥挤的问题。周恩来看到后，非常满意，高兴地说：这不是很好嘛！

到了1956年，有一些部委的领导又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议，并且选好了地址，作好了规划。他们一个劲地鼓动周恩来说：“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政务院应该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地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没有政府大厦。我们也应该建一个自己的政府大厦。”

周恩来听了以后，坚决不答应，并且一再做说服工作。他说：建政府大厦不是当务之急，利用中南海现有的旧房屋，不是一样可以开会、办公吗？他曾对薄一波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花厅、西花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国务院大楼。”

1959年前，在筹建全国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的过程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又提出兴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地址选在府右街西侧，从西安门大街到西长安街之间的地方。周恩来看到盖

大楼的方案和设计图纸后，有一天晚上把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找去，了解筹划盖大楼的情况。高登榜把盖政府办公大楼的几种设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又一次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为了这件事，周恩来还征求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居民住房都得要拆掉。周恩来马上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他还强调说：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当机立断，撤销了这项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计划。

后来，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一有机会就以有人建议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问题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讲求“排场”的思想作风。

还有一件类似的事，被周恩来发现后制止了。国务院有个小礼堂，是建国初期修建的，为机关工作人员作饭厅用。这个小礼堂又矮又小，只能容纳五六百

人。后来，国务院召开重要会议时经常使用它，感到不方便。为此，国务院行政部门曾几次提出重盖这个礼堂的计划，并给周恩来写了报告，但是他始终没有批准，事情就拖了下来。到了60年代初期，有的同志认为重建不行，可以小维修，这样就不必请示周恩来了。于是，未经批准，行政部门便派工人动工拆房进行维修。但刚拆了一个房角和窗户，就被路过这里的周恩来发现。他立即吩咐有关同志停止拆房，工人们只好按原样修复了。

50年代末期，有一天周恩来外出看望民主人士。当车路过北京东四时，他突然看见路北面耸立起来一幢正在建筑的大楼，便惊奇地问秘书：“这是什么大楼？”秘书摇摇头说不知道。

回到办公室后，秘书立即查问，才知道这幢正在兴建的大楼是中国民航局大楼。秘书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作了汇报，周恩来一听就火了：“告诉他们，给我马上停下来。”

这时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但也不得不停下来。那时的民航归交通部门管，因此，大楼停工之后，交通部门的同志反映说，大楼停止修建，损失太大。他们又委托周恩来的秘书做工作，希望周恩来同意将大楼继续修完。但周恩来就是不答应。他说：“我把你们

这个秃顶子的半拉子工程展览展览，看你们这些大搞楼堂馆所（指办公楼、礼堂、宾馆、招待所）的还敢不敢再搞。”

60年代初，一些省的省会为中央在当地召开会议准备了豪华的宾馆，周恩来历来反对这样做。那时，天津市也修建了一个高级宾馆。说来凑巧，宾馆刚盖起来没多久，就赶上周恩来去天津检查工作。当时天津市的一位主要领导人想让周恩来到那个高级宾馆去住一下。大概是认为，只要去住了，他们建的这幢高级宾馆就是被周恩来认可了，也就自然而然地合法化了。

可是，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那天，周恩来到天津，天津市领导派了小卧车来接。周恩来上车后，小车直奔那个高级宾馆而去。

周恩来是老天津了。他15岁时就随伯父到天津，当年就考入闻名国内、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南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整整学习了四年。因此，周恩来对天津市的地理环境很熟。在车上，他见汽车行进的路线不对头，不是去原来老住处的方向，连忙问：“哎，这是上哪去啊？”

陪同的天津市一位领导同志说：“有一个新地方，想让总理去那里下榻。”

周恩来急忙说：“不行！别去！我不去！”他感到

这里头有问题，生气地说：“快！把车给我开到老地方去！”

汽车只好调头开到老地方，周恩来又住进了建国后他每次来天津时的住处。

后来，周恩来的秘书去看了看天津市修建的高级宾馆。这个宾馆不太大，类似钓鱼台国宾馆一幢楼的规格，是专门给中央领导同志来开会或视察时住的。周恩来没有去住，天津市的领导人着急了，就又找到周恩来的秘书帮助说情，说至少也要想办法动员周总理去那里看一看，但周恩来却连看都不去看。到头来，天津市的那位领导遭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1962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东北访问。送走外宾之后，他顺便来到辽宁省鞍山市巡视工作。正好鞍山市刚建好一座新的宾馆。负责接待的同志想让周恩来作为第一位客人住到这座新宾馆里去。可是周恩来到宾馆一看后，坚决不住，执意要换一个普通的住处。他对鞍山市的负责人说：“宾馆为何盖得这样好？要知道，现在全国有很多地方还比较困难哩。我不能住在这里！”

后来，周恩来在市内无意中又发现了新建的大礼堂。这个礼堂虽然不大，只有千把个座位，可是它的外部造型有很多地方仿造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也是

廊柱式建筑，大门前也有几根大圆柱子。周恩来说：“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了。”并马上指示：“这个礼堂不准用。”

接着，周恩来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冷轧厂。这个厂是苏联援建的一项工程，1958年开始兴建。但是到了1962年，由于苏方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合同中规定的苏联设备有一大批没有进来，只好撂在那里。周恩来说：“轧机主要零件还没有进来吧，看来人家是在卡我们的脖子。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打破封锁嘛。”

当周恩来看到停工待料的一米二轧机时，又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面，该有多好哇。”

后来鞍山市的领导为建宾馆和礼堂的事，向周恩来作了检讨。

你们把室内原来的东西给我换回来

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讲艰苦朴素，他总是先从自己做起。50年代末期，他曾为身边工作人员未经请示维修西花厅的事发过脾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居住。那是一座老式旧平房，光线很暗，地是大块方砖铺成的，夏天很潮湿，冬天很凉；柱子上的油漆已经脱落；厨房又在房后的小平房里，做好饭送到吃饭的地方要绕过一条露天的窄小胡同，到冬天，饭菜送过来时已经快凉了。无论是办公、居住条件都比较差。特别是周恩来有时膝盖疼，这和他常年累月在砖地上办公有很大关系。看到这种情况，作为主管行政生活和警卫工作的秘书们心里很不安。有关部门几次提出要给周恩来修房，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常说，这个居住条件比延安的窑洞强多了。

有一位女记者金凤曾回忆说，50年代，有一次，她采写了一条重要新闻，送给周总理审阅。周总理看过

之后说：“这个消息是否发表，还得回去请示毛主席。你和我一起到中南海去，在我办公室等着。”达到中南海不久，天空乌云密布，忽然下起了大雨。金凤正在总理秘书办公室等着去向毛主席请示的总理，突然听到滴答滴答的滴水声。抬头一看，原来是陈旧的屋顶漏雨了。秘书赶快找了一个旧脸盆，放在有裂缝的砖地上，盛接雨水。又找了一个旧脸盆，直奔总理办公室去了。看见秘书空着手从总理办公室走出来，金凤忙问：“总理办公室也漏雨了吗？”秘书点点头。金凤吃了一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有谁会相信几亿人口大国的总理还身居漏室呢？金凤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眼睛湿润了。

周恩来的秘书也为维修房子的事着急，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正巧，1959年初，周恩来到外地出差，时间是近两个月，邓颖超也不在北京，秘书感到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决定把房子维修一下。这次维修，本是略加改善，并没有大动，只是在原来的砖地上铺了地板，从厨房到饭厅修了个带棚的通道，另外为了改善室内光线，把顶灯改了一下，窗帘换成白色的。后来看到走廊立柱的油漆全掉了，太破旧，索性刷了一下油漆。经过这次简单的维修，房屋确实显得焕然一新了。但是由此招来了麻烦。

2月份，周恩来从外地回到北京，一进门就怔住了。他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房子谁叫你们修的？”他发脾气了。如果光是发脾气倒还好，这回真动了感情，拔腿就走，临时住到钓鱼台去了，不同意回来住。他要求说：“你们把室内原来的东西给我换回来”。秘书们一看周总理是真生气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原来的旧窗帘和其他旧东西又换了回来。

3月15日，周恩来视察河北。到天津时；他专门找了个时间和秘书个别谈话。秘书猜想，准是又要批评修房子的事。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和颜悦色，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早就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我的心思。房子不是不能修，可是不能修得太好嘛！现在要我去住，我心里不好受，要是我总不回去住，你们心里又不好受。这样吧，你们把屋内陈设全换回原来的东西，我回去住。”秘书连忙说：“都换回来了，您回去住吧。”

这次“修房子事件”，是秘书一手负责的，周恩来出差在外地并不知情。即便这样，他还是三次在国务会议上作自我批评。他对几位副总理和部长说：“借此机会我得做自我批评，修了房子。你们可以到西花厅去看看，修的标准太高了，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这是个很坏的头。

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

周恩来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作了表率。